

第一章

道家生命观的理论渊源与文化背景

第一节 老子的史官身份与道家 生命观的理论渊源

在人类思想史上，有些思想具有原创性，有些思想具有继承性而更多的思想则是继承与创新并存。继承前人的资料进行理论的创新。道家生命观便是如此。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生命观念，它具有原创性；但理论上的原创性并不排除其资料上的继承性，道家生命观从前人那里所继承的历史资料便构成了它的理论渊源。这一渊源大致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上古神话中的生命意志，二是原始宗教中的生命崇拜，三是古代典籍中的生命关怀。而这些史料之所以被老子所吸收，是与他的史官身份分不开的。

一、老子的史官身份

关于老子的史官身份 先秦、汉代典籍中均有记载。最完整地记载老子生平事迹的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这里首先涉及众所周知的三个人物即李耳、老莱子、周太史儋与老子的关系问题。其实，司马迁在记此三人时所使用的语气完全不同。他在记述老子即李耳这种关系时语气十分肯定：“老子者 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 名耳 字聃 周守藏室之史也。”接下来便写孔子问

礼于老子以及孔子在弟子面前赞老子像龙之事。最后一段写老子之学的宗旨、老子著《道德经》以及老子的归宿：“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司马迁对老子本人的记述到此为止。这里明确记载了老子的籍贯、姓、名、字、著作以及孔老之间的关系。据此，老子即李耳，亦即老聃，应该不会有什问题。但由于司马迁在记载上述情况之后，又提到了老莱子和周太史儋，于是关于老子究竟是李耳还是老莱子或太史儋，便产生了争议。事实上，司马迁在写周太史儋即老子时，只是以“或曰”的口气将当时或先前某人的观点记载下来，但他同时也记载了人们否定这种关系的观点。其文曰：“自孔子死之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曰：‘始秦与周和，和五百岁而离，离七十岁而霸王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据这段文字，周太史儋距孔子二百多年，而孔子又曾问礼于老子，若说老子就是周太史儋，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至于老莱子，司马迁只是将有人说他也是楚国人，著书十五篇宣扬道家思想，与孔子同时等情况记录下来而已，并未将他与老子挂上钩。并且，老莱子既然著书十五篇，他与“著书上下篇”的老子就不可能是一个人；老莱子既然是宣扬道家思想，他就只能是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人物，而不可能是道家之学的创立者老子本人。所以，笔者认为据《史记》所载，老子应是姓李，名耳，字聃者，他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并且为时很久。后来他看到周王室越来越衰败，便辞官西去，经好友尹喜相求而著书上下篇，即五千余言的《道德经》，最后不知所终。类似的情况在《庄子》中也有记载。《天道》篇说：“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儋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是往因焉。’”于是孔子见了老儋，言仁义之性，

被老儋教训了一顿。下文又改称“老儋”为“老子”，正与《史记》所载相互印证，说明老子即老儋，为周王室之史官。

关于老子的史官身份，《史记》还提到为柱下史。此外，《礼记·曾子问》之《正义》引《论语》郑注云：“老儋，周之太史。”马叙伦在《老子校诂·老考》中又说：“老子盖小史。”总之，不管是征藏史、守藏室之史、柱下史，还是太史、小史，老子曾担任过史官，则是可以肯定的。正是根据这一点，《汉书·艺文志》将道家思想之源定为史官文化。其文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史官文化注重历史经验的传承，这种历史经验既有社会性的一面，也有个体性的一面。社会性的历史经验主要是国家存亡之道，个体性的历史经验主要是个体生存之道和事业成败之道。老子对这些历史经验进行高度的抽象概括，将其凝练为“道”。比较老子思想与古代典籍的关系，他受《周易》、《尚书》、《诗经》的影响最大。从生命哲学、生命观的角度来看，对老子影响最大的是《周易》。同时，作为史官，老子的历史感特别强。他对远古文化极为留恋，远古神话传说和原始宗教对他的影响都很大，这在其生命观中的反映尤为突出，这些都构成了老子及道家生命观的理论渊源。

二、老子生命观与上古神话中的生命意志

神话是哲学的史前史，各民族的神话对该民族的哲学都有或多或少的影响，中华民族也不例外。中国上古时代曾有一个辉煌的神话时代，只是由于中国古代理性文化过于早熟，加之正统思想代表儒家“不语怪力乱神”传统的影响，致使许多古代神话被湮没不传。不过从一系列考古发现以及有关传世文献中，人们仍可感受到上古神话的余晖。

中国上古神话的基本主题是生命意志的张扬，表现了上古先

民在想像中对死亡的反抗。生命意志是人类一切意志中最浓烈、最顽强的一种，它与人类死亡意识的产生一同出现。在上古时代主要是通过神话的形式表现出来。中国上古神话有几种主要类型，一是创生型神话，二是抗争型神话，三是转生型神话，四是不死型神话。这四类神话都是原始先民生命意志的不同表现形式。创生型神话所反映的生命意志是以创造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最典型的是“盘古开天辟地”^①。盘古具有顽强的生命意志，面对死神的到来，他不是束手就擒，而是将自己的生命意志转化为创造意志，将他的身躯化做宇宙万物，用他一个人的生命换来了宇宙万物的一片生机，他的生命也因此而在绵延不绝的宇宙生命中得到永存。这则神话所表现的生命主题，是针对个体生命的有限性对人类生命创造力的束缚，幻想盘古寿尽之日正是他生命创造力登峰造极之时，通过对盘古垂死一搏的辉煌成就的赞颂来化解对生命有限的遗憾，从而在心理上战胜死亡，捍卫生命意志。抗争型神话所反映的生命意志是以生命征服意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著名的有“夸父追日”^②。这则神话所表现的是人类为捍卫自己的生命而与威胁人类生命的自然条件所进行的抗争。为了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夸父率领他的部落与暴虐的烈日进行抗争，企图越出太阳和干旱的笼罩，去寻找维系生命的水源。虽然夸父最后倒在烈日下再也没有站起来，但不朽的生命意志却使死于干渴的夸父化做了滋润的桃林，夸父的生命转化成了桃林的生命，并通过桃林的生生不息而获得永恒。转生型神话的突出代表是“鲧复生禹”^③。这则神话是说，上古洪水泛滥，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鲧为了制服洪

① 详见《五运历年纪》。

② 详见《山海经·海外北经》。

③ 详见《山海经·海内经》。

水，未经上帝允许便窃取上帝的息壤以堵塞洪水。此举触怒了上帝，鲧因此而被处死于羽山。鲧的肉体虽然死去了，但顽强的生命意志依然存在。不仅如此，这种顽强的生命意志在鲧死后的三年中孕育出一位更伟大的生命——中国古代最终征服洪水的大禹。禹是鲧生命的再生，面对鲧顽强的生命意志，上帝不得不让步，让禹继续治水。禹以生命再生的更高智慧和更大的生命能量制服了洪水，完成了鲧未竟的事业，弘扬了鲧的生命。在这则神话中，鲧不是像盘古和夸父那样化生为别生命，而是化生出后代。这表明了中国古人对群体生命的无限性超越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认识，反映出原始先民对生命的执著开始从执著于个体生命向执著于群体生命转化的心理历程。不死型神话的典型代表是“精卫填海”^①。这则神话说的是炎帝有一女名叫女媧，女媧到东海游泳，不幸淹死。但女媧死去的只是其形体，其不屈的生命意志并没有死，而是化做了不死的精卫鸟。为了向吞噬她生命的东海讨回公道，精卫硬是口衔木石，意欲将东海填平。这一神话与前几则神话一样，都反映出中国古人生命意志的顽强以及追求生命目标的艰难。

上述神话为后人留下了这样的启示：既要追求生命价值的实现以及永存不朽，又要做好承受种种苦难和失败的心理准备。这种追求生命实现的忍性意识，这种顽强的生命意志，无疑对中国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这其中包括对道家生命观之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中国上古神话中的生命意志对道家生命观的影响是通过老子的神话思维和复古情结而实现的。关于老子的思维方式，学术界大致有几种观点，有的认为是理性思维中的否定性思维，有的认为是非理性思维中的直觉思维，还有的认为是

① 详见《山海经·北次三经》。

集多种思维于一体的意象思维，也有少数学者认为老子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运用了大量的神话思维，反映了神话思维向哲学思维转化的情形。应该说在老子生活的春秋末期根本不存在自觉形态的思维科学，老子也不可能有意识地运用今天所谓的逻辑思维或直觉思维或神话思维去思考问题。所谓老子哲学的思维特征，无疑是接受了西方哲学熏陶的今人分析出来的。但这又不等于说老子哲学本身没有自己的思维特征。不过笔者认为，对老子哲学的思维方式不可一概而论，因为老子是综合运用了多种思维方式，只是这种综合运用在他那里是不自觉的。而这多种思维方式中就包含了神话思维。

将神话与思维联系起来，似乎不合逻辑。因为神话是想像的产物而在传统认识论和心理学中想像与思维是两个全然不同的范畴。简言之，想像算不上思维，故神话也算不上思维。直到 18 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柯开创神话学，将神话看做一种人类思维形式并把神话思维看做人类思维发展的初级的且是必经的阶段神话思维及其价值才渐被人们所承认。19 世纪两位德国哲学家谢林和黑格尔继承了维柯神话学的某些思路。谢林认为，人类认识真理的过程是诗 - 哲学 - 科学 - 诗，而神话恰恰是科学复归于诗的中间环节，因此神话思维代表着人类思维的方向。黑格尔揭示了神话的理性内容认为神话既有感性表象形式又有理性实质内容神话思维是二者的统一。到 20 世纪，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在其《象征形式哲学》一书中提出了“mythical thought(神话思维)”这一概念认为神话是人类最早的象征符号之一并认为人类的抽象思维和艺术思维都植根于远古神话思维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对神话思维的超越后者是对神话思维的保留。至此神话思维已较为人们所了解和接受了。

神话思维的突出特点是具有直观性、具象性和想像性 汉字的

象形特征恰恰最有利于这种思维方式的保留与传承，所以神话思维在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早期哲学中被大量保存下来，这又以《老子》、《庄子》最为突出。神话思维在《老子》中主要表现为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类比推理的大量运用。老子哲学在思维方式上的根本特征就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老子》一书反复表现了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因为天道如何如何，所以人道也应如何如何。如《老子》第 23 章以天地的作为不能长久来类推人类的作为也不能长久；第 43 章以自然现象的“无有人无间”来类推人类行为的“无为之有益”，等等。类比推理在逻辑思维和神话思维中都经常使用，何以见得老子的类比推理不属于逻辑思维而属于神话思维呢？这是因为类比推理在这两种思维中的着眼点不同，可靠性也不同。神话思维中的类比推理往往只着眼于两种事物表面的相似性，就以甲类推出乙；而逻辑思维中的类比推理则是以两种事物之本质属性的相似性为基础，并且还要根据被类比现象中相似属性的数量才能由甲类推出乙。在《老子》中，我们看到的情形恰恰是前者而非后者。自然界的刮风下雨不能长久与人类作为不能长久之间、自然界的“无有人无间”与人类的“无为之有益”之间并无本质相似性，其相似只是表面的。老子却从前者类推出后者，这种类推正反映了神话思维直观性的特点。必须指出的是，在通常情况下，思维形式与思维内容虽然可以分开，同一思维形式可以服务于不同的思维内容，同一思维内容也可以通过不同的思维形式表达出来，但在原始人的神话思维那里，情形却不是这样。在原始人的思维活动中，不仅思维形式十分直观、具象，主要表现为神话思维，而且思维内容也极为单纯，他们只对与自身及周围事物之存在有关的问题即生命问题进行思考，只思考生命的由来和存续问题，其他与生命存在本身无直接关系的更深一些的问题尚未进入原始人的思维视野。因此，在原始人的思维活动中，神话思维形式与生命主

题这一思维内容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神话在历史上的传承与影响也同样体现了这种结合。这首先体现在原始宗教中，表现为生命崇拜这一思维内容与某种神话思维形式的统一；接下来是体现在夏商周以及春秋战国这个中国理性文化的肇始期，表现为生命关怀与某些神话思维的残留形式的结合。具体到老子那里，便表现为生命关怀与神话类比思维形式的结合。换言之，老子在接受上古神话传统的影响时，既受到了神话思维形式的影响，也受到了神话思维内容的影响。上古神话中所表现出的顽强的生命意志便通过这种文化传承关系而对老子发生了深刻影响，成为老子生命观的理论渊源之一。

三、老子生命观与原始宗教中的生命崇拜

从一定意义上说，人类最初的宗教即原始宗教产生于人类的生存危机。正是在强大的自然力量对人类生存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原始先民开始探讨自然与人生的奥秘，探讨人类的生存与大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先后产生了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生殖崇拜、图腾崇拜以及祖先崇拜等最原始的几种崇拜。应该说，这几种崇拜的产生都与原始先民生命意识的觉醒有关，但能直接反映原始先民生命意识的是母神崇拜和生殖崇拜。

母神崇拜产生于母系氏族社会，是女性在物质生产和人类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在宗教观念上的反映。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牛河梁发现的女神庙表明，母神崇拜在我国古代确实存在。生殖崇拜是原始先民出于增殖氏族人口、维护氏族生存之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宗教意识，表现为对人类生育能力和生殖器官的崇拜。生殖崇拜最初产生于原始先民对生命孕育于母体、产生于女性生殖器这一现象的直观观察，并通过与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中心意识的结合而得到巩固。近年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辽西喀左县东

山嘴发掘出制造于约 5000 年前的两具意在表现生育意向、祈求多产多育的女性裸体塑像。有些学者还指出，我国考古发现的原始器物绘画形象中鱼纹、蛙纹、叶形纹、花瓣纹、瓜纹等均是女性生殖器的象征，将这种象征图案刻在器物上正是女性生殖崇拜的反映。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同时也随着原始先民对男性在生命产生过程中的作用的认识，女性生殖崇拜逐渐向男性生殖崇拜过渡。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考古发现中有大量的男根崇拜遗存，主要是陶祖和石祖。“祖”的甲骨文和金文作“且”状，像男根，专家指出这正是男性生殖崇拜的典型表现。原始宗教中的母神崇拜和生殖崇拜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崇拜。从表现形式上看，原始先民崇拜的是母神的生育能力和男女两性的生殖器官，实际上他们崇拜的是生命本身。人类的男女性别器官若无产生生命的功能，是不会成为原始先民崇拜对象的。所以，母神崇拜和生殖崇拜的产生实际上是原始先民生命意识强烈的表现，它体现了两种生命意识，一是个体生命意识，二是群体生命意识。母神及男女生殖器官发挥功能的结果，既是新的个体生命的诞生，又是群体生命的延续，人类生命因此而得以绵延不绝。

原始宗教中的母神崇拜、父神崇拜及生殖崇拜不仅对原始文化中的诸多领域如宗教、神话、艺术、风俗和原始思维等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成为中国后世传统文化的重要渊源，其对儒道两家的影响尤为明显。有些学者指出，儒家文化是父系氏族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其源头可以追溯到父神崇拜和男性生殖崇拜，道家文化是母系氏族文化传统的衍生物，其源头可以追溯到母神崇拜和女性生殖崇拜。一种文化的源头当然不是单一的，但儒道两家文化的源头之一的确可以分别追溯到原始社会的男女二神崇拜以及生殖崇拜。就道家来说，这种渊源关系在《老子》中有非常明显的反映，突出表现为崇母意识和崇牝意识。在老子哲学中，生命的总根

源是“道”。道作为一种无形可见的生命之本，它是如何化生出有形可见的生命形态的呢？为了说明这一点，老子吸收了原始宗教中的母神崇拜和生殖崇拜观念，将道生万物比拟为母生子、牝生幼。“母”在《老子》中凡 7 见，指的就是“道”。以“母”称“道”，一方面是对原始宗教中作为生命之神的母神进行理性抽象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突出“道”的创生功能。老子认为“道”包含着孕生一切生命的潜能，一切生命产生的根据都存在于“道”之中。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老子又说“道”是“万物之母”。在确立了“道”的母体地位之后，老子便提出了“贵食母”的价值取向，主张“得其母”、“守其母”，表现出崇母意识。“母”之所以值得崇拜，是因为她有生命创生功能，崇母意识的实质是对母性创生能力的崇拜，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崇拜。生殖崇拜在老子那里也有明显表现，这反映在其崇牝意识中。《老子》第 6 章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牝”乃女性生殖器，是生命所从出者，为母性生命力的集中体现。以“玄”说“牝”，是赞叹女性生殖器之神秘玄妙，体现了老子的崇牝意识。但老子崇牝并非崇拜其实体形态，而是崇拜其创生功能。所以同其崇母意识一样，老子的崇牝意识所反映的依然是一种生命崇拜意识，它是对原始宗教中的母神崇拜与生殖崇拜意识进行继承与提升的结果。

四、老子生命观与古代典籍中的生命关怀

中国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生命哲学，中国生命哲学的理论源头可以追随到《周易》。《周易》充满了生命关怀的意蕴，这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周易》将整个宇宙视做一个生命系统。宇宙生命由两种最基本的生命力产生，这就是阴阳。《周易》中的阴阳观念由人类生命现象中的男女观念抽象而成，《易经》以“--”和“—”表示。“--”和“—”代表两种相反的实体、功能、属性和力

量 两者交感结合 形成了宇宙生命。宇宙生命的形成经历了层层演进的过程 最初形成的是八种最基本的生命现象,《易经》谓之“八卦”并以相应的符号表示之。八卦本身又构成了生育与被生育的关系 乾坤两卦为父母 生育了震、巽、坎、离、艮、兑这三男三女。八卦既生 相互之间又构成了一种相感相生的关系 由此而化生出丰富多彩的大千万象、宇宙生命。对其属性、功能、法则、原理,《易经》以六十四卦概括之。《周易》由此而构建了一个融天、地、人于一体的宇宙生命系统。其次,《周易》将宇宙间的最高品德理解为创造生命 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的最大品德就在于具有生命力 能创生新生命。再次,《周易》将宇宙间的基本法则归结为生命法则。《易传》将《易经》六十四卦产生与演变的法则看做是对宇宙万物固有法则的模拟 这一法则就是“易”而“易”的法则也就是生命法则 所谓“生生之谓易”。第四,《周易》充满了生命忧患意识。《易传》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周易》的价值也正在于“明于忧患之故”。《周易》中的忧患对象不是别的 就是生命问题 包括生命的产生与发展问题、生命的存在与延续问题、生命的维持与提升问题以及个体生命与群体生命的关系问题等。而这些问题归结起来就是如何防患于未然、如何趋吉避凶,从而使个体生命得以存在与提升、群体生命得以延续与发展、宇宙生命得以生生不息的问题。最后《周易》还探讨了生命运动的规律 揭示了诸如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等人生规律 要求人们将这些规律视为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总之 整部《周易》都是围绕生命问题而展开的 生命的存在与超越问题是《周易》的基本问题 生命关怀是《周易》的根本关怀 终极关怀。

《周易》作为中国哲学的源头 其浓郁的生命关怀对中国哲学史上几乎所有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在儒道两家思想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儒道两家共同弘扬了《周

易》中的终极关怀 光大了《周易》中的生命精神 各自传承了《周易》生命哲学的不同方面。要言之 儒家侧重传承了《周易》的群体生命意识。孔子的仁礼之学、孟子的仁政学说、荀子的群分思想、董仲舒的纲常观念、韩愈的仁义学说以及宋明新儒家的天理观念等 都是其表现形态。而道家则着重传承了《周易》的个体生命意识 从老子创立的“长生久视之道”、庄子提出的“养生”、“全生”、“达生”之方 到杨朱、《吕氏春秋》的“贵生”、“重己”主张 以及黄老道家提出的一整套养生之术，都是个体生命意识张扬的体现。在道家内部 道家诸子对《周易》生命意识的传承也表现出逻辑渐进性。老子着重传承的是其生命存在意识，庄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突出了生命超越意识，黄老道家将老子的生命存在意识和庄子的生命超越意识落到实处，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超越灵与肉、心与身的短暂而趋于永恒的问题 由此而使蕴含于《周易》中的生命关怀得以充分展现。

总之，道家尤其是其创始人老子分别从上古神话中的生命意志、原始宗教中的生命崇拜以及《周易》等典籍的生命关怀中吸取了有关生命问题的一系列观点与资料，以此作为其理论创新的基础 通过将其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思潮和时代精神相结合 创立了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初具理论形态的生命观。

第二节 楚淮道家发源地与道家 生命观的文化背景

道家生命观既是古老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也是特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产物。就其自然环境来说，道家生命观是在淮河流域这块特定的土壤中产生的 就其文化背景来说 它植根于楚文化之中。

一、道家文化发源地 淮河流域

文化不仅依赖于人的创造 也依赖于自然的环境 不仅具有民族性 而且具有地域性 这是人们的共识。中国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性 在不同的地域 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的差异 导致经济活动、风俗民情、宗教信仰、价值取向乃至人的性情心态都有不同的特征，而这些因素的综合差异便使得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明显的地域之分。中国传统文化的定期期是在先秦时期。就地域文化而论 学术界一般将先秦文化划分为邹鲁文化、三晋文化、燕齐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反过来说 要从深层次上揭示和把握一种文化的特质 有必要追寻这种文化所产生的地域 因为任何文化的形成都受制于它赖以产生的地域的自然环境、政治特点、经济类型及民俗传统。那么道家文化产生于何地呢？

若将道家文化主要代表人物的出生地或生活地一一分列于地图 我们会惊异地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他们都是淮河流域的人。道家创始人老子生于春秋末期的宋国相地 后宋为楚所侵占 相又成为楚国领土，其地在今淮河支流涡河流域。老子思想的重要继承和发展者庄子生活于战国中期的楚国蒙地，在今淮河北岸的安徽蒙城县。《黄老帛书》是老子之后道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作 关于其作者，有关学者考证是西楚淮河流域人，具体地点可能在淮南一带。鹞冠子是战国末期的楚国隐士，也是淮河流域的西楚人。

《淮南子》是西汉黄老之学的集大成之作，其作者是淮南王刘安。汉末魏初名士中凡受道家思想影响较深者也是淮河流域人。譬如，率性放达的汉末名士戴良是淮河支流汝河之南人；魏初“三曹”是淮河之北的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 建安七子中的王粲亦是淮河流域的山阳人。魏晋玄学新道家中，首开正始玄学之风的何晏是淮河流域的南阳人；正始之风的推动者夏侯玄是沛国谯人；

正始玄学的主要代表王弼亦是淮河流域的山阳人；竹林玄学的主要代表嵇康、阮籍也生活于淮河流域。嵇康是谯郡人，位于淮河支流的涣水之滨。阮籍则是陈留尉氏人。此外，深受道家自然主义影响的竹林名士刘伶是沛人（在今安徽濉溪县西北）。上述情况足以说明，淮河流域是道家文化的发源地，道家文化的形成与淮河流域有着斩不断的内在联系。

那么，淮河流域为何能孕育出道家文化呢？在淮河流域的滋养下产生、成长起来的道家文化又为何特别重视对生命问题的思考和探讨呢？要弄清这些问题，就必须了解淮河流域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

二、淮河流域的自然环境及其对道家生命观的影响

从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来看，淮河发源于今河南省桐柏山的太白顶，流经河南、湖北、安徽，进入江苏省洪泽湖，分两路入江、海。流域面积 27 万平方公里，涉及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五省。从自然环境和条件来看，淮河流域的特点之一是支流众多，湖泊密布，温泉无数，雨水充足。这一特点与生命的孕育和成长息息相关，它使得生活在淮河流域的人们对水的特性与作用及其同生命的密切关系有着特别的关注。

水与生命有着天然的联系，它可以是生命的孕育者和滋养者，也可以是生命的威胁者。对于水与生命的这两方面联系，淮河流域的人们都有着切身的体验。一方面，从水对生命的威胁来看，由于特殊的气候条件和地形地貌，淮河流域是我国历史上水灾最严重的地区。从气候条件来看，淮河流域位于北纬 31—36 度、东经 112—121 度之间，处于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带，降雨量的年内和年际分配不均匀，多集中在夏秋之间。加之这里容易受台风影响而产生强降雨，因而为水灾多发地带。从地形地貌来看，淮河流域三

面为山区丘陵,平原面积大,众多支流源短流急,淮河干支流中下游地势低洼,河道平缓,每逢降水,洪水就汇集中下游,流泄受阻,极易引起水灾。严重的水灾对人民的生命构成极大威胁,每当灾害来临,无数生灵转眼之间便为洪水吞噬。在强大的洪水面前,再强硬的生命也抵挡不住洪水的侵袭,生命显得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但另一方面,水也是生命之源、生命之本。没有水,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产生,更不可能存在。是水孕育了生命、滋养了生命,生命自始至终都离不开水。所以,生于颍水之滨的管子说:“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①对水的这两种特性和作用,生活于淮水之滨的老子有着深刻的体认。前者引起了他的感叹:“水看起来那么柔弱,却有那样大的力量,他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②后者引起了老子对水的赞美:“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③将水看做是“上善”,可见老子是尚水的。综观老子之论水,其尚水的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他认为,水既有利物之功,又有不争之性。而水的不争之性之所以为“上善”,实因其“善利万物”。所谓水善利万物,是指其善于滋孕、养育万物,成为万物生长的必要条件,指其能将自己的生命力灌注到万物之中,使万物获得生机。这表明,老子之尚水,既是贵尚其不争之性,也是推崇其利物之功,包含着对水作为生命之源的价值肯定。第二,水有柔韧之力,能以柔克刚。水的柔力之所以为老子所崇尚,是因为在他看来,柔力与生命是紧密相联的,它属于“生之徒”,即生命之力,所谓“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

《管子·水地》。

见《老子》第78章。

见《老子》第8章。

稿。”^①可见老子尚水，乃是对水的柔弱不争之性中所蕴涵的顽强生命力的崇尚。当然老子尚水决不意味着他对水对人类生命构成的威胁持认可态度。在他看来水之所以对人类造成危害是因为人类没有因水之性而引导它若能因顺水的自然之性则可化害为利。

淮河流域自然环境的第二大特点是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这一自然条件决定了这一地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考古资料表明早在 7000 年前，淮河流域的原始农业就已经发展到相当成熟的阶段。当时淮河以北地区以种植粟、黍和水稻为主而淮河以南则以种植水稻为主。生活在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淮河流域的人们，对土地的旺盛生命力及其对作物生长和人类生活的决定性影响有着深切体认。曾盛赞水为万物之本源的管子对土地的作用也有充分认识认为“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筮也”^②。的确，水、地均为生命之本源。淮河流域水原文化不仅激发了管子对水地生命力的赞誉，也同样启迪着老子对水地生命力的玄思。所以，老子既尚水也崇地主张“人法地”。《老子》中“地”共 17 见老子表现出两种赞叹之情，一是赞叹其生命力之久，所谓“天长地久”^③二是赞叹其创生力之强所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④。可见老子主张人法地，一个重要方面是从地的生命力上着眼的是要人从地的生命力中受到启示。以上情况表明，淮河流域独特的自然环境决定了老子等道家奠基人物特有的理论兴趣和致思方向，这就是对生命赖以产生的条件有着深刻的体认，对生命的成长过程有着细致的观察，对生命的存在颇为关注。这种理论兴趣促使

见《老子》第 76 章。

《管子·水地》。

见《老子》第 7 章。

见《老子》第 32 章。

老子认真思考了生命问题，力图为人类的生命存在寻找终极依据并提供理论指导；这种致思方向决定了老子的理论创造是在生命领域进行的，决定了他的哲学本质上是生命哲学，也决定了他的生命观的特有指向。

三、楚淮文化的生命意蕴及其对道家生命观的影响

从文化渊源来看，淮河流域与黄河、长江一样，是我国远古人类的发祥地之一。考古资料表明，最晚在四五十万年前，沂源人就在淮河流域活动。到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人类活动遗迹已遍布全流域。传说中我国原始古人类分为三大集团，即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淮河流域地处三大集团之间，有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淮河以北的河南西北部属于华夏集团势力范围，淮河以南的豫南和皖西大部分地区属于苗蛮集团，其余地区均属东夷集团。道家发源地属于东夷集团的势力范围。从国别来说，春秋以前，淮河流域诸侯国林立。到了春秋时期，楚国势力北扩，淮河两岸许多地区为楚国占领。战国时，楚国的都城北迁至淮河岸边的寿春（今安徽寿县），所以，道家文化的发源地从大的地理位置来说是在淮河流域，属于东夷文化，从国别来说是在楚国，是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楚文化滥觞于中原，楚王族最初是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迁徙到南方江汉一带的。楚族的祖居地在今河南濮阳，此地正处于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的交界地。在承受了华夏、东夷文化的多方滋养后，楚文化又南迁江汉，与苗蛮文化融合。楚文化在南方发展壮大，孕育成熟之后，又向北扩展，与东夷文化相融合，并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为淮河流域的主体文化。基于这种复杂关系，本文将道家文化的背景文化称为“楚淮文化”。

楚淮文化充满了生命意蕴，这在其宗教信仰、风俗习尚、文化特质中都有明显体现。